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作为分标题,细数了冯雪峰历年来的“罪行”。这也是此前进行的多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你处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很显然,上层已决定将冯雪峰打为右派分子,只是还需补办一些材料,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并未上报过什么材料,当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此时已不重要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书记奉命行事,召开党支部会议将冯雪峰开除出党。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严厉处分。

冯雪峰怎么就从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毛泽东对冯雪峰的态度、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

1949年以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一些重要的文艺运动,毛泽东都是直接发起者和指导者。1954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对冯雪峰领导的《文艺报》在此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不满。对冯雪峰在《文艺报》上转载李希凡和蓝翎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的按语,毛泽东进行了5处批注,此后又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对冯雪峰进行批判。冯雪峰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检讨自己,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之后,冯的处境更加艰难。

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与党内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召开的27次中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及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冯雪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批判打倒定为右派分子,并做了深刻检讨。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化的,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中宣部就有公开批判冯雪峰的意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向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这表现是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现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

冯雪峰一生著述颇丰,但其诗歌作品并不多。如楼适夷先生所言,“在他一生勤奋的写作生涯中,写诗的时间只占据极小的比例,留下来的诗篇也寥寥可数。”(楼适夷:《诗人冯雪峰》)冯雪峰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湖畔”时期和“上饶集中营”时期。前者主要收录于1922年出版的《湖畔》与1923年出版的《春的歌集》这两部诗歌合集中,后者收录于1943年出版的《真实之歌》中,后来冯雪峰对其进行了删减、精选,1946年以《灵山歌》为名出版。

诗集《灵山歌》收入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中所写的诗歌17首。与其“湖畔”时期的诗歌相比,这些诗歌最明显的特征在于,诗歌的容量有所增加,其中不乏一些长诗,这在冯雪峰以前的诗歌中是不常见的。

《灵山歌》中的诗歌写作于1941—1942年之间,这时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之后,冯雪峰投身革命,他基本上已经中止了诗歌写作。在狱中,他重新拾起久已搁置的诗笔,开始诗歌创作。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日子,他自称“最黑暗的日子”,这些诗“应该看作他最重要的作品”。只是,这时的诗歌,已经与“湖畔”时期有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意旨与艺术范式,周良沛说,“雪峰两个短暂的诗的时期的作品,一眼看来,色调的反差很大”(周良沛:《中国新诗库·冯雪峰卷》卷首),可谓之诗歌的转变。

冯雪峰为什么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中断了诗歌的创作?他又为什么在狱中重新进行写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与当时流行的左翼诗歌相比,冯雪峰的诗歌观是独特的。在冯雪峰那里,诗是与生命同源的,他从来没有刻意地去经营诗歌。所以,诗歌在他那里,从来都是真正来自灵魂的需要,是他最隐蔽的心灵表达路径。“我住在和人们隔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里,我远离朋友和亲人,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确实没有痊愈之期。因此,我的心境早就变成非常的坏。有时简直想狂呼暴跳,以使生命早日的消灭。但我当然没有这样做,极力使自己平静,而结果便是更无聊,毫无生趣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我以写诗消遣……”(冯雪峰:《雪峰文集》)这段回忆为我们阐明了他再次从事诗歌写作的内在因由,那么,在这样的个人困境中,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呢?

冯雪峰选择以何种姿态发言?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冯雪峰,其诗歌写作的内在心理机制是异常复杂的。“孤独”、“空

#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的冯雪峰

□汤志辉

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黎之:《文坛风云录》)这份报告没有正式公布,只是有的文坛亲历者引用过。因政治风向很快转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计划好对冯雪峰的批判没有进行,冯雪峰暂时逃过一劫。由此可见,冯雪峰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的文艺思想一概不受上层待见,对他的批判只差一个时机。

在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时,这个时机到了。对冯雪峰的批判开始于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先批判了丁陈,继而将矛头指向冯雪峰,说:“雪峰同志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的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峰的问题。接下来的几次会又有人文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作协党组成员严文井发言批判冯雪峰,这还只是零星的批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全社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揭发,并撤销了冯的整风组长职务。

更猛烈的批判则是8月14日第17次会议,夏衍所作的“爆炸性发言”。此次批判之前的11日下午,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人曾与冯雪峰谈话,谈话主要是告诉冯雪峰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对他进行批判。冯雪峰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并且周扬提出把批判的重点放在1936年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问题。让冯雪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36年的问题怎么会在当时还成为一个需要拿出来批判的问题。这也可看出左翼文学界宗派之争在当代的延续,历史问题一到运动和斗争的时候,就会被翻出来,重新作为斗争的武器。更何况,1936年的问题是周扬的心头之痛。

夏衍的发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揭发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所述内容,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引起了“爆炸性”效果。这次批评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据黎辛回忆:“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痛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黎辛:《我也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再加上楼适夷的号啕大哭,使得会场更其紧张。接下来的几次会议持续对冯雪峰进行批判。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开始报道批判冯雪峰的消息与文章。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彻底将冯雪峰打入另册。8月28日刊发了何其芳在16日会议上的发言稿《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文章称:“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一个人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并从文艺思想和作品方面,解读了冯雪峰的反党思想。9月1日发表了田间的《是什么理论家?——读冯雪峰的“寓言”有感》,对冯雪峰的寓言创作进行了批判,文章称“他的某些所谓寓言,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宣言。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正在进行中。作家们,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

在各方压力之下,冯雪峰在9月4日第25次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其中首先就检讨了1936年在上海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宗派活动的错误,这也是对冯雪峰批判最严的地方。其他关于与胡风、丁玲等关系也作了检讨。他检讨:“从根本上,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的个人主义的严重,使我对社会、对集体、对党,经常发生对抗的情绪。我轻视思想改造,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这样,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同党的要求,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的领导。我入党,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个人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我始终执迷不悟,不去改造自己以适合党的要求,却要求党适合自己,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情绪和言行。这样,我同党的关系,可以用一句来概括: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冯雪峰全集》第9卷)对冯雪峰的检讨,大家比较满意,检讨后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大家也认为他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方面是配合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艺界执权者利用反右运动,排除异己力量,30年代以来左翼文坛上的宗派主义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坛。冯雪峰的受批判与被打成右派分子,与这种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反右”之前,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对党的工作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来,并积极鼓励大家提改进的建议。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他在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时,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据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的专稿《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各出版社负

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显示,在座谈会上,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他说,按照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像出版社,又不像企业单位,好像似衙门”。这些言论在进入“反右”运动后,都成了“现行罪行”。

关于冯雪峰在整风期间的“现行罪行”还有很多。在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冯雪峰的文章中,就称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很多人不敢相信,甚至为他抱不平。杜鹏程曾获得冯雪峰帮助,他的《保卫延安》就获得冯雪峰的赞赏,他在得知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忧愤交加,在《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一文中描述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记得反右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任务是把全国作协反右斗争情况带回来向同志们传达。我们一去就参加大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坐在我身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给我说:冯雪峰是他们的社长,在他们那里过组织生活,可是把他定成右派,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全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同志听到这事之后甚至哭了!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象。”

别人替冯雪峰抱不平,那么,冯雪峰在被打成右派后,他自己是怎样的呢?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抑郁和苦闷。王士菁在《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中记述了冯雪峰当时的情况:“有时我到苏州胡同一六号他的宿舍去看他,他躺在书桌旁边的藤躺椅上,脸色铁青,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王任叔同志告诉我,雪峰同志当时的的确曾想到过要毁灭掉自己。”但是很快,冯雪峰就投入到工作当中,他没有怨艾,不卑不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一名普通编辑。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中说:“雪峰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跟我没有中断往来,不过很少走动了。以他那样的脾气,在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处分以后,对党没有怨言,也不自轻自贱,表现沉着和冷静,仍然一如既往,热心党的文艺事业,继续研究鲁迅,和我见面的话题都是关于文学研究方面的,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编辑《郁达夫文集》,写出《郁达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又继续编选1918至1949年的《新文学三十年集》中的短篇小说部分。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到1961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往是模糊的、简单化的,从而削弱了抒情的深度。

“美”是冯雪峰诗歌的关键词,也是其诗歌的“内核”所在。在《灵山歌》中,几乎每一首诗都会出现“美”,豪美、秀美、慧美、远美等,构成冯雪峰诗歌的核心美学诉求。或可以说,正是“美的引领”,使得冯雪峰得以超越那血淋淋的监狱现实,而始终将希望与理想寄托于彼岸,这既是炼狱中淬炼出的火焰,更是灵魂深处飞出的希望:“从我空洞的灵魂的深处,飞出美的晶光!”这里的美,既是自然的,也是灵魂的(伟大的不屈者的美姿);既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远美)。它是冯雪峰在狱中的想象性远景,更是其革命情怀的具象化呈现。在血淋淋的革命现实中,冯雪峰的《灵山歌》没有悲哀和抑郁,而是在对“力与美”的想象与颂扬中,传达某种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既是一个战士的精神使然,更是一个诗人独特的诗观使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冯雪峰的人格与诗格是高度合一的。

## 四

《灵山歌》中以《雪的歌》为代表的诗歌,扭转了其早期诗风,以凝练厚重的诗思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情愫,完成了对其早期诗歌写作的超越的同时,为中国新诗史贡献了佳作。我们看到,作为诗人的冯雪峰,虽然其诗作寥寥可数,但他的诗歌观以及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使其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特别是在1940年代的战争语境中,他的诗歌虽然难以避免二元对立式的诗歌书写模式,但其充满主观战斗色彩的意象、物我合一的抒情方式,使其与流行的左翼诗歌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进而避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在一首题为《普罗米修斯断片》的短诗中,冯雪峰写到:“忍耐是不屈,而愤怒是神圣,而顽强简直是天性!”普罗米修斯因为盗取了火,送给人间而遭到宙斯的惩罚,被关押在高加索山上。在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身上,冯雪峰获得了高度的自我认同。盗天火,为人间带来光明,带来智慧,带来力与美,这是信仰与志趣。故可以说,《灵山歌》中的作品事实上秉承了中国传统“明志诗”的传统,而这一点正是《灵山歌》区别于通常意义上左翼“政治诗”的地方。”(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1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于是,在《灵山歌》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他充满激情的志向,看到了那炼狱之火中冶炼的新自我。

《灵山歌》,冯雪峰在狱中明志,以诗歌之淬炼自己的不屈灵魂。

# 《灵山歌》:冯雪峰的“狱中明志”

□马春光

“虚”是其必须面对的,如果我们在诗歌中按图索骥,就会发现他这一时期的内心现实。在一首颇具象征意蕴的诗歌《孤独》中,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入口得以窥见当时他的心态状况:

哦,孤独,你嫉妒的烈性的女人!  
你用你常穿的藏风的绿呢大衣  
盖着我,

像一座森林

盖着一个独栖的豹。

但你的嘴唇滚烫,

你的胸房灼热,

一碰着你,

我就嫉妒着世界,心如火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是非常个别人的,它异常强烈地传达了狱中生活的苦闷与压抑。这大概是冯雪峰诗歌中情感最为浓烈的一首诗,有着强烈的象征派的风格。感情之强烈,抒情主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之紧张,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显然不是他上饶时期最典型的诗歌。与其说,冯雪峰的身体在上饶集中营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毋宁说,他在这里经历了一场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炼狱。在“孤独”中,不断孕育着新的自我。这是一种对“虚无”的测量,对“自我”的叩问:

怎样的奇迹呵——

当我袭击着空虚,

当我深入黑暗的阵地,我碰见了我自己!

我于是俘获了我自己!

我于是根据自己心头的疼痛,

计算着我对空虚的撞击有多么重!

于是,书写这个“自己(自我)”的孕育与形成,展示新的自我所具有的革命志趣,就成为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编选诗集《灵山歌》)最核心的诗学任务。

## 二

《雪的歌》是《灵山歌》中最长的一首诗,同时也是冯雪峰所有的诗歌中篇幅最大的一首。《雪的歌》共6节,约200行。全诗以“雪”为抒情主体,以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表达了诗人异常激烈的革命热情。全诗充满了奇异化的浪漫想象,潜在地表达了冯雪峰的革命热情。

“雪”是一种经常被誉为深邃而丰富的自然景物,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有丰富的美学积淀。在冯雪峰之前,以“雪”

造,在表达了超乎寻常的革命激情之余,也很容易流入“空洞”与“虚假”的陷阱。《雪的歌》是对自我的找寻与阐发,可以说是做到了“物我合一”,但缺少“作为生命个体的内在丰富性”。

## 三

“力”与“美”是冯雪峰诗集《灵山歌》中的核心元素。对于冯雪峰而言,他惊叹那些自然界中奇异的力,同时期待扭转历史的力。冯雪峰在诗歌中始终向往“光明”,充满着不屈的力量。当流行的小调歌曲在对革命远景的想象中,往往陷入“概念化”和“空洞化”的陷阱。冯雪峰的《灵山歌》运用巧妙隐晦的手法,规避了概念化的泥淖,从而远离了左翼政治诗歌的生硬“标语”模式。

在《灵山歌》这首诗中,对“政治信仰”的认同与坚守,没有体现为声嘶力竭的呼号,而是“在一种更为厚重的历史纵深里升华为一种远为深广的悲剧意识和历史感情”:

我们望得见灵山,

哦,怎样奇异的山!……

从这山,我懂得了历史的悲剧的不可免,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奔赴那悲剧而毫无惧色,而永不退屈!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生来就为理想的实现,

我懂得了一切山川的秀丽的由来,

为什么它总有一种神奇的秀气在隐现。